

拉美区域主义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李德鹏 思特格奇

内容提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长期存在着多样的区域主义主张和行动，其实际成果如何则见仁见智。本文认为，拉美区域主义的特点在于“弱而不竭”“起伏不定”：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在相对固定、上限较低的区间内不断振荡的过程，同时具有稳定性和振荡性。为解释这一情况，本文借助布罗代尔关于时间的历史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认为中长时段因素塑造了拉美区域主义稳定的一面，而短时段因素则造成了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振荡。中长时段因素包括地理因素、人文因素和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对拉美区域主义的影响都有两面性，大体而言，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推动了区域主义发展，而经济因素则是阻碍区域主义取得进一步成果的主要因素，使其活动长期处在较低的水平。短时段因素指政府政策因素，取决于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变化很快，造成了拉美区域主义的不稳定性。本文以南美区域主义为例，结合近年来南美洲国家联盟和南美进步论坛的发展情况，说明不同因素在拉美区域主义实践中的作用。

关键词：区域主义 一体化 南美洲 南美洲国家联盟 南美进步论坛

作者简介：李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拉丁美洲研究系博士研究生；思特格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非洲与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2）04-0047-28

^{*}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创新工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球治理问题研究”项目的资助。

自独立以来，拉丁美洲国家从不缺乏种种区域主义的愿望与行动，但实际结果则往往十分复杂。从过程看，拉美区域主义的方向常常摇摆不定，整体进程也常大起大落；从结果看，相比欧洲一体化，拉美区域主义在深度、成果方面都较为有限。不过，学者奥利弗·达贝内提出，拉美区域主义是“不稳定但持续的，有危机也有恢复力”^①。在他看来，尽管问题重重，但拉美区域主义的韧性也颇为可观。本文认同达贝内的观点，认为拉美区域主义长期处在一种“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状态，既具有振荡性，同时这种振荡又是在一个较稳定的区间进行；既不会趋于消亡，又无法取得大的突破。本文将主要论述拉美区域主义同时表现出这些特点的原因，并结合近年来南美洲区域主义的代表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和南美进步论坛（Prosur）的兴衰说明这一点。

一 拉美区域主义的整体情况

本部分内容首先将明确本文所讨论的“拉美区域主义”的具体含义，并在之后结合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史，说明拉美区域主义在整体上具有“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特点。

（一）“区域主义”/“一体化”的含义

本文中，“区域主义”（Regionalism，也译“地区主义”）和“一体化”（Integration）被用作同义词，有时交替使用。达贝内将区域一体化定义为“（次国家、国家、跨国）政治单元互动渐增的历史进程”^②，本文对区域主义/一体化的理解也大致如此。本文较为宽泛地界定这两个概念，认为它们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同时认为既有的区域组织和制度、尝试构建区域组织和制度乃至加强区域国家间合作的实践都是区域主义/一体化的一部分。不过，本文主要研究的也是政府层面的实践，不讨论社会层面关于拉美区域主义思想和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和部分学者对拉美区域主义/一体化的理解是不同的，部分学者对一体化的定义更窄。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学者倾向仅从主权让渡的角度理解一体化，这样看一体化实际是区域主义的高级形式，比一般的

^{①②} Oliver Dabène, *The Politics of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5, p. 10.

区域合作更深入。或者说，区域合作是“政府间的”（intergovernmental），而一体化是“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① 在持此观点的学者看来，拉美众多区域组织体现的应该仅仅是合作而非一体化。^② 但由于本文引用的很多学者并没有严格区分一体化和区域主义，甚至拉美区域组织的官方表述也会用到“integration/integración”一词，所以本文在行文中不再区别这两个术语，对一体化也采用最广义的理解，将其等同于区域主义。

从时间维度看，本文认为，拉美的区域主义/一体化可以追溯到拉美国家独立初期。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拉美区域主义源于二战后，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基本同时开始。这实则也与概念的定义方式有关。例如，《牛津比较区域主义手册》将区域主义理解为“主要由国家主导的，在至少3个国家间建立和维持正式制度和组织的过程”。依据这种严格的定义，拉美一体化要自二战后算起。^③ 早期拉美区域主义的努力的确没有形成有较多现代意义的正式制度和组织，但尝试联合拉美各国的国家层面活动却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本文看来，拉美区域主义是一个持续200年左右的长期历史现象。^④ 本文延展观察拉美一体化的时间长度，也是为了能考量一些作用于中长时段的影响因素，如地理、文化等因素。

在地理层面，“拉美”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泛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加勒比地区的区域主义在本文中也偶有涉及。不过，加勒比国家都是小国，且基本都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才独立，加勒比地区的区域主义的影响力更弱，历史也更短。整合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区域主义组

① Detlef Nolte and Brigitte Weiffen, “Introduction: Regionalism under Stress”, in Thomas G. Weiss and Rorden Wilkinson (eds.), *Regionalism under Stress: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 2–3.

② 参见 Oliver Dabène, *The Politics of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10; 张凡:《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国别基础、互补与竞争》,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5期,第93页。

③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Introduction: Framework of the Handbook an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s”, in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7.

④ 不少学者也倾向将拉美区域主义的源头追溯到拉美国家独立初期,参见 Salvador Rivera, *Latin American Unificati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Rivera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2014, pp. 34–83; José Briceño-Ruiz and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Resilience and Acquis in Latin American Regionalism”, in José Briceño-Ruiz and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eds.),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gents, Systems and Resilience*,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 13–30.

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则直到21世纪才出现。由于这些原因，本文所谈的拉美区域主义实际更多涉及西葡语国家间的区域主义。

本文所指的拉美区域主义不包含涉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区域主义。北美国家发起的一些区域主义实践确实也有拉美国家参与，但由于美国巨大的体量，拉美国家在参与这类区域主义活动时，客观上难免处于边缘乃至依附地位。此外，很多拉美一体化活动诞生的初衷即有区别于美国、抗衡美国的因素。因此，本文把美国在西半球营造的“泛美主义”国际组织体系及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区域组织视为拉美区域主义的竞争对手，而非拉美一体化的某种形式。

（二）拉美一体化的“起伏不定”与“弱而不竭”

19世纪时，拉美一体化的倡议和行动主要出现在西语国家间，不同西语国家发起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彼此的联合。这些会议包括1826年玻利瓦尔发起的巴拿马会议、1847—1848年针对厄瓜多尔考迪罗引入欧洲君主的计划而由秘鲁发起的利马会议、1856—1857年智利发起的圣地亚哥会议、1864—1865年秘鲁与西班牙冲突引发的第二次利马会议，等等。这些会议往往以政治、军事联盟条约作为成果，只是所有条约都没有得到相应拉美政府的一致批准。^① 尽管在19世纪拉美也存在一些与一体化相反的分裂趋势，如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和中美洲联邦分别解体、拉美国家之间出现战争等，但大体上看，在19世纪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产生新的区域联合主张。从19世纪末到二战前，拉美国家的区域主义相对陷入低潮^②，只有20世纪初巴西、阿根廷、智利间曾在局部尝试建立联盟或缔结某种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时期，美国在美洲取

^① José Briceño Ruiz, “Autonomía y Desarrollo en el Pensamiento Integracionista Latinoamericano”, en José Briceño Ruiz,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y Ángel M. Casas Gragea (eds.),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a y Caribeña: Política y Economía*, Madrid: FCE, 2012, pp. 29–33; Salvador Rivera, *Latin American Unificati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Rivera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2014, pp. 34–83.

^② 本文主要讨论政府层面的区域主义，在这个层面上19世纪末及20世纪上半叶是拉美区域主义活动的低潮期。但在思想领域，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曼努埃尔·乌加尔特（Manuel Ugarte）和萨尔瓦多·门迭塔（Salvador Mendieta）等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大量阐发了主张拉美（或拉美的一些次地区）团结、一体化的思想。秘鲁的阿普拉党（APRA，亦称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Augusto Cesar Sandino）等这一时期活跃的政治力量和人物也有关于拉美一体化的主张。

得独大的地位，通过侵略、干涉直接控制了一些中北美、加勒比小国，并开始推动创立以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后更名“美洲国家组织”，OAS）为代表的泛美体系，这些都冲淡了拉美国家间区域合作的意味。二战后，拉美一体化更多以创立具体组织机制的方式推进，一体化整体的起伏也变得更频繁。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拉美一体化在发展过程中常有方向和程度的变化，认为存在着几“波”一体化。例如，有观点认为在二战后拉美存在着四波一体化潮流，分别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发展主义的）、70年代至80年代（修正发展主义的）、9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放的区域主义的）和21世纪初，分别被不同的思想主导。^① 总体看，可以说拉美区域主义经历了19世纪的第一波“涨潮”与随后几十年的“落潮”，在近几十年中则每10~20年经历一番起伏。

本文无意具体探讨每一波一体化的具体特点及成因，回顾历史只是为了说明拉美区域主义有着“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特点。如学者们所说，拉美区域主义的形势往往呈“波浪状”，这说明拉美区域主义的实践是不稳定的、有其内在弱点的，但也有较强的恢复力。^②

拉美区域主义的不稳定性（“起伏不定”）体现在其高峰与低谷的落差。从不同时间截面看，拉美区域主义的景观是大为不同的。在一些时刻，能看到区域倡议或组织井喷式的涌现、各国对区域主义的高涨热情，而在另一些时刻，则只能见到区域主义的黯淡景象，此时区域组织碌碌无为乃至分崩离析，而区域各国则将注意力转向域外或国内。例如，20世纪60年代，人们见证了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LAFTA）、加勒比自由贸易协会（CARIFTA）、东加勒比共同市场（ECCM）、安第斯集团（AG）的纷纷成立。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美国家整体陷入了债务危机，中美洲多国还陷入内战，区域大多数国家无暇顾及一体化。此时过去区域主义模式（倾向发展主义、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紧密相关）的弊端

^① Olivier Dabène, “Explaining Latin America’s Fourth Wave of Regionalism: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a Third Kind”, 2012. https://www.academia.edu/8680372/Explaining_Latin_Americas_fourth_wave_of_regionalism. [2021-11-23]

^② 何塞·鲁伊斯和安德烈·里瓦罗拉对“恢复力”（resilience）的概念有较多论述，认为在区域一体化层面，“恢复力”可以被理解为“在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中，从危机和挫折中恢复的能力”。参见 José Briceño-Ruiz and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Resilience and Acquis in Latin American Regionalism”, in José Briceño-Ruiz and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eds.),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gents, Systems and Resilience*,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3-16.

也逐渐显露，像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这样的组织也没能实现消除域内贸易壁垒的初衷，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组为拉美一体化协会（LAIA）。^①可以说，拉美区域主义活动呈现出发展的波动性，有其高点与低点、高峰与低谷。

拉美区域主义的脆弱性（“弱”）则在于其成就的有限。拉美区域主义所取得的总体成就并不令人满意，一直存在深度不足、流于表面的问题，很多区域组织的发展程度与其最初设想都有一定距离，与更成功的欧洲一体化不可同日而语。有学者用“象征性地区主义”来形容拉美和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认为其实质是“借地区合作之名行巩固主权之实”。^②且不论拉美一体化实践的动机为何，但“象征性地区主义”这一称谓的确道出拉美一体化进程的虚弱一面。同时，拉美一体化也是高度分裂的。从一开始，旨在囊括全部拉美国家和仅覆盖某个次区域的一体化活动就同时存在，在功能上也往往重叠；近几十年中，指导思想对立的组织之间彼此竞争，造成一体化力量的内耗。如学者所言，“分化、重叠的区域项目的存在不是成功一体化的体现，而是反映出潜力的耗竭”^③，不同区域组织间的相互倾轧还常导致一体化整体进程的停滞与倒退。

但另一方面，拉美区域主义的重重问题却也没有让它陷入彻底停滞，这就是其具有恢复力或“弱而不竭”的一面。一波区域主义浪潮可能会被否定或被新的区域主义形式和主张取代，但实现区域团结、整合的根本目标却很少遭到质疑。遭到否定的只是区域主义的具体外在形式，其内核精神尽管模糊、薄弱，却不会有消失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看，拉美区域主义也立于某种不败之地。很多时候，甚至曾被否定的元素也会卷土重来。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开放的区域主义”在21世纪初拉美左翼复兴潮流中遭到批判，趋于式微，但2011年成立的太平洋联盟（PA）又多少复活了其倾向自由贸易、对外开放的精神。

① María Esther Morales Fajardo, “Un Repaso a la Regionalización y el Regionalismo: Los Primeros Procesos de Integración Regional en América Latina”, en *CONfiné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y Ciencia Política*, 2007, Vol. 3, No. 6, 2007, pp. 72–74.

② 陈型颖、王衡：《象征性地区主义及其发生机制——以东亚和拉美为例》，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1期，第117页。

③ Andrés Malamud and Gian Luca Gardini, “Has Regionalism Peaked? The Latin American Quagmire and its Less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47, No. 1, March 2012, p. 117.

总之，可以将拉美区域主义看作在特定区间内不断变化振荡的进程：拉美区域主义既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能与欧洲一体化发展水平比肩，但同时也不会消逝在历史中。这样一来，在振荡变化中，拉美区域主义也表现出某种不变的稳定性：其存在是稳定的，其发展水平也已被大致框定。因此，本文认为拉美区域主义同时有着“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复杂面相。

二 对拉美区域主义特点的解释

本部分在对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特点的既有解释基础上，借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理论对影响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类。之后，本文提出，拉美区域主义“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特点，是由地理、人文、经济等中长时段因素和政府物质权力、政府意识形态等短时段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基本框架

一些研究欧洲一体化的经典理论如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等关注了低政治领域功能外溢、政府（政治精英）作用、社会认同等要素对于一体化的影响。^① 尽管很多学者在研究拉美区域主义时不一定会会有意识地运用以上理论，但这些理论所关注的变量也都在拉美区域主义的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

或多或少地结合了欧洲一体化理论提出的观察角度，大量从事拉美区域研究的学者基于历史和现实，对影响拉美区域主义成败的因素做了细致的归纳。其中，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的是拉美区域主义较为失败的一面，认为后者可以归咎于拉美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总统外交的过分依赖、区域内部贸易水平低、外部干涉、区域内部缺乏领导者、意识形态分歧、领土争端等因素。^② 关注拉美区域主义恢复力的学者则提出，对政治自主

^① 参见 Antje Wiener and Thomas Diez,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6 - 11.

^② 参见 Carlos Malamud,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 Diagnosis and Proposals”, in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Vol. 7, No. 2, 2015, pp. 95 - 97; Salvador Rivera, *Latin American Unificati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Rivera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2014, pp. 11 - 22; 温大琳:《当前拉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载《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3期,第22-26页;周志伟:《当前拉美一体化现状及陷入困境的原因》,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5期,第42-46页。

和经济发展的追求、共同的文化和认同是驱动一体化长久不衰的基本要素。^①

本文认为，以上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这些因素往往彼此有重叠之处，或分属于不同层次、维度，难以简单地并列。而且，既有研究往往更侧重于解释拉美一体化成功或失败的单一方面，但实际上拉美区域主义“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特点又同时辩证存在、彼此关联，需要一个统一的解释。本文希望对前人提出的种种变量加以进一步抽象、提炼，提出一个较简洁的分析框架，帮助厘清不同变量间的联系，说明拉美一体化“起伏不定”“弱而不竭”的原因。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分析历史时使用了结合“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方法，也被称为“长时段理论”或“三种时段理论”。这种历史观是本文借鉴的。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布罗代尔将上述三种时段分别解释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对应“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群体和集团史”（经济、国家、社会、文明等）和“事件史”。^②布罗代尔对于历史时段的划分，有助于厘清拉美区域主义中不同影响因素的层次和作用。布罗代尔也提出，长时段的历史是“几乎静止的”，中时段的历史是“节奏缓慢”的，而短时段的事件史则是“短促迅速和动荡的”。^③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一文中，布罗代尔又提出“每一‘当前的事件’都聚合了不同起源、不同节奏的运动：今天的时间起源于昨天、前天和从前的时间。”^④布罗代尔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段有不同的节奏，不同节奏同时影响着当前事件，这对于理解拉美区域主义的“变”与“不变”是有帮助的。

本文认为，拉美区域主义同时呈现的稳定与不稳定，分别是相对恒定的因素和富于变化因素影响的结果。前者是布罗代尔所说的相对静态的中长时段因素，后者是动态变化的短时段因素。具体而言，中长时段的因素框定了

^①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and José Briceño - Ruiz, "Introduc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 Linking Past and Present", in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and José Briceño - Ruiz (eds.), *Resilience of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evelopment and Autonomy*,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8 - 9.

^{②③}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0页。

^④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2页。

拉美区域主义的上限与下限，赋予其“弱而不竭”的特点，即拉美区域主义能取得的最高成就是有限的，但最惨淡时也不至于消亡；而一些短时段的因素，则令拉美区域主义起伏不定。本文对中长时段因素、短时段因素的界定和布罗代尔大同小异，但本文不再区分长时段因素和中时段因素，而是将拉美或西半球的地理条件、人文背景、经济结构（在全球体系的位置）都笼统视为“中长时段”因素。拉美内部的力量分配情况和各国的主导思潮、意识形态则往往受个人、单一政府的影响较大，属于布罗代尔所说的短时段因素。

（二）中长时段因素及其影响

如布罗代尔所说，地理因素从时间层面看是近乎静止的；而在本文研究的时段内（自拉美独立至今），拉美国家的人文景观大体也是稳定的：从独立至今，至少承载各国文化的官方语言文字没有较大变化，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在殖民时期就已定型的。^① 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这两大中长期因素实际成为拉美一体化最主要的动力，它们共同催生了对拉丁美洲的认同。大西洋和太平洋将整个美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分隔开，而由于整个美洲大陆土地广袤，很多拉美国家特别是南美国家与美国、加拿大也有遥远的距离。在文化层面，拉美的主要国家都经历了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因而具有文化上的共性，而和盎格鲁—撒克逊美洲拉开了心理距离。即使很多加勒比岛国历史上主要受英国殖民，但种植园经济的历史传统和大量非洲裔的存在也让他们与两个北美国家文化迥异。正是地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构建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这一概念与认同，使得追求拉美团结成为区域人民一种天然的诉求。

当然，地理因素与人文因素对拉美一体化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地理上，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确实离美国较近，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而拉美内部存在的一些自然屏障如安第斯山脉、亚马孙雨林、加勒比海等也增加了各国彼此之间联系的困难，将拉美划分为不同的次区域，从而分散了区域主义的力量。同样，诸多英语、荷兰语加勒比国

^① 也有些例外，如墨西哥独立后，由于推行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政策，西班牙语逐渐取代过去的印第安本土语言成为优势语言，但这实际也是对殖民时期传统趋势的延续。参见曹佳：《墨西哥民族整合进程中印第安人的国族认同研究》，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2页。如今在一些国家，印第安本土语言的地位相比过去上升，但也未能取代欧洲语言的主体地位。

家与西语、葡语国家在文化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两类国家间的文化认同较弱，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囊括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外全部西半球国家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要等到2011年才诞生。甚至讲葡语的巴西对其他西语国家的态度也一度是若即若离的，巴西并不总是像其在21世纪初那样积极支持一体化、拥抱邻国。著名学者莱斯利·贝瑟尔（Leslie Bethell）甚至认为巴西成为“拉美”的一部分更多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问题。^①

经济因素也是在中长期大体保持相对稳定的因素，其对拉美区域主义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这里的经济因素是指这一情况：自独立以后，作为整体的拉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直处于落后、边缘、依附的地位。应该承认，拉美国家在独立后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充满起伏，不乏短期和局部的亮点，但从长远和全局看，拉美在近200年内一直没能缩小与西方国家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数据显示，拉美整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独立伊始就已远落后于美国。在之后的时期中，拉美各国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在缩小与美国差距方面都成效有限，很多国家还逐渐被美国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在20世纪以后，拉美整体（仅指西语、葡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低于美国的25%，自1960年以来，拉美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低于美国的一半。^②在经济表现长期低迷的背后，拉丁美洲国家一直未能实现产业、技术升级，一直未能从事“创新的机会窗口大、报酬递增和协同效应强”的生产活动^③，在全球经济中被锁定在一个较为不利的位置。这种情况也是自拉美国家独立以来就未曾根本改变的，无论是出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尝试都未能找到实现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道路。

这种情况也是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主要阻力。经济因素的作用是本性的：很多学者归纳的一体化不利因素也都源于拉美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势地位。

① 莱斯利·贝瑟尔：《从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视角看巴西与拉丁美洲的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5页。也有观点认为，尽管巴西真正认同“拉丁美洲”这一具体概念较晚，但是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比莱斯利·贝瑟尔的判断更密切、更积极。参见 José Briceño - Ruiz and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Brazil and Latin America: Between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Paths*, Lanham · Boulder · New York ·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7.

② [英] 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张森根、王萍译：《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第三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85-490页，第534-535页。

③ 王效云：《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5月，第147页。

正是由于拉美国家整体都有经济方面的困难，所以无法产生有能力为一体化提供稳定公共产品的领导者；由于拉美国家普遍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彼此间互补性也很有限。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数据，自1962年以来，拉美区域内部货物出口在全部货物出口中的占比鲜有超过20%^①，导致拉美区域主义不能像欧洲那样通过低政治领域的进展逐步深化；拉美国家的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同样源于各国经济的脆弱性，这类思想与行动也会阻碍一体化的深入。

当然，经济的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拉美区域主义动力。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区域团结可能是改变经济不利地位的一种手段。在20世纪中叶，拉美区域主义的倡导者如普雷维什等学者、技术专家认为，单一拉美国家市场狭小，希望通过区域主义提供更大市场以支持当时拉美国家普遍推行的进口替代战略。

总之，地理、文化、经济三个中长时段因素导致拉美区域一体化长期“弱而不竭”的命运。这三种因素的具体作用都是复杂的、双面的，但大体而言，地理、文化因素塑造了拉丁美洲的认同，从而提供了拉美区域主义最主要的动力，而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则是拉美区域主义发展所面临种种障碍的最主要源头。这三个因素之间的互动使得拉美区域主义的动力和阻力实现了一种动态平衡，让拉美区域主义的波动局限于特定的水平，不会跌破下限也无法超越上限，落入“弱而不竭”的宿命。

（三）短时段因素及其影响

短时段因素则如布罗代尔所言，有更强的偶然性和变化性。布罗代尔认为短时段因素更多是“个人的”，影响拉美区域主义的短时段因素是一系列单个政府的政策，包括拉美政府的政策和一些区域外部大国的政策。政府政策可以从物质和观念两个层面去观测：物质层面指单一政府推行某一政策时所具有的物质力量；政府的意识形态则作为观念，决定着政府对区域主义的态度，也就是决定着物质力量使用的方向。

从物质权力的角度看，独立以后拉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大体没有变化，一直处在相对边缘、次要的位置，但短期内各国国力的变化是很频繁的，政府所能调动资源的多少也随之涨跌。一些幸运的国家有可能

^① CEPALSTAT, “Exportaciones Intraregionales de Bienes por País de Origen”. <https://cepalstat-prod.cepal.org/cepalstat/tabulador/ConsultaIntegrada.asp?idIndicador=1925&idioma=e>. [2021-08-18]

在短期内因经济高速增长而国力大增，也可能因为短期的经济危机、革命、战争而实力剧减。国家权力的变化会影响到各政府对区域主义的投入程度。作为面积最大的西语国家，在19世纪上半叶，墨西哥曾是很多西语国家政治联盟倡议的发起者，但因为国内内战和与美国、法国的战争，墨西哥的这种努力总是难以持续。^①与墨西哥相仿，南美大国的国力变化也是很有戏剧性的。例如，南美大国都有发展的黄金期，如阿根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西在20世纪60年代时都是如此，但阿根廷在20世纪中叶左右开始逐渐被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困扰，而8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的债务与经济危机则都让巴、阿两国短期内元气大伤；21世纪初两国都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增长而国力上升，又都在近年来因经济萧条而再次把更多注意力转回国内。与此相应，相关区域主义进程也会随着这些区域大国国力的增减而进退。

当然，除了国家物质权力以外，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其能运用国家物质权力的程度。这两者并不总是等价的，所以，本文直接关注的也是政府具有的物质力量而非国家实力。有时尽管国家整体的物质力量强大，但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执政者也没有余力在区域层面投入精力。一些学者和项目在测评国家物质实力时，会把军队规模、军事投入作为一个指标。^②这样一来，在国家处于内战、动荡的情况下，这些指标往往会随着军队的扩张而上升，但上述情况的出现其实意味着政府的脆弱。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物质能力或许是强大的，但政府能投入外交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例如，哥伦比亚的内战就会限制该国对区域问题的关注。

与拉美区域主义相关的意识形态因素更加复杂。学者卡洛斯·马拉默德认为当前拉美各种政治、经济、社会行为体都不否定区域一体化的好处^③，而

^① Mario Vázquez Olivera and Fabián Campos Hernández, “Latin American Integration: A Mexican Perspective”, in José Briceño-Ruiz and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eds.),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gents, Systems and Resilience*,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 183–206.

^②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6.0)”,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21.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national-material-capabilities>. [2020-11-01]; J. David Singer,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in Bruce Russett (ed.), *Peace, War, and Numbers*, Beverly Hills: Sage, 1972, pp. 19–48.

^③ Carlos Malamud,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 Diagnosis and Proposals”, in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Vol. 7, No. 2, 2015, p. 93.

萨尔瓦多·里维拉也提到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文献中都罕见反对一体化的言论。^① 不过，实际上也确实存在与拉美区域化有所抵牾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强调本国主权、利益的民族主义或实用主义立场^②无疑就会阻碍区域主义的推进。可以说，在拉美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民族主义，拉美区域主义和将拉美整体视为“大祖国”（Patria Grande）的民族主义较为重合^③；而当以本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高涨，地区国家间的摩擦常会增加，区域主义事业会由此被削弱。^④

支持一体化的不同意识形态彼此间也存在着观念上的对立。如前所述，拉美区域主义的不同潮流侧重不同，有偏重安全领域的、与进口替代战略紧密相连的发展主义的、偏向对外开放的，等等。不同意识形态主导的区域主义活动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和路径，彼此并不兼容。

这种情况下，区域主义的发展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国家间是否存在支持区域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识。如果区域国家政府都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区域主义则难以推进。如 19 世纪时，拉美国家间的战争就让区域主义陷入停滞。20 世纪 70 年代时，拉美的一些军政府都受到地缘政治思潮的影响，很多邻国间（如巴西与阿根廷）有很强的敌意，区域主义也难有进展。对不同区域主义路径的偏好或其他意识形态矛盾也会撕裂团体合作。例如，民主政权和非民主政权的矛盾使得智利皮诺切特政权在 1976 年退出了当时的安第斯条约组织^⑤，而 2006 年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则因不满其他成员国与美国缔结自由贸易条约而退出了安第斯共同体。

以美国为代表的区域外大国对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有很强的影响。美国如果直接对拉美部分国家进行占领和控制，这些国家无疑无法再参与拉美层

① Salvador Rivera, *Latin American Unificati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Rivera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2014, p. 13.

② 一些力量如太平洋联盟提出在区域主义进程中要更加务实、弱化意识形态，但这种态度本身也可以视作一种意识形态主张。实用主义的立场有时倾向弱化拉美国家间情感认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而主张加强与更能增进本国贸易利益的域外国家的联系，这无疑会削弱拉美区域主义。

③ 有学者将之称为“区域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与一些超国家的泛民族主义有些相似。参见李紫莹：《拉美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嬗变：民族认同与多元表达》，载《世界民族》，2016 年第 4 期，第 22 - 28 页。

④ 有时，区域主义和一国的民族主义也是重合的。很多理论家认为区域合作符合每个拉美国家的利益。这大体上是成立的，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总会有区域主义利益分配、成本分担等问题引发民族主义者的不满。

⑤ Salvador Rivera, *Latin American Unificati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Rivera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2014, p. 182.

面的区域主义。而若美国等域外大国只是制造了尚未付诸实践的威胁，那么反而会激发拉美国家的团结，如19世纪中诸多西语国家间的会议就是为应对域外大国干涉而召开的。同时，如果美国等域外大国对拉美更加关注，愿意给予拉美国家一些实惠，部分拉美国家也难免会疏远区域主义事业，转入以域外大国为中心的轨道。

域外大国对拉美的政策部分地取决于其执政者的对拉认识、对拉定位，这广义上可以视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域外大国的对拉政策也是高度变化的。美国尤其如此，尽管有些总统如西奥多·罗斯福、特朗普，会对拉美国家采取干涉、威胁或歧视性的政策，有些总统如小布什会忙于其他事务而忽视拉美，但是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采取的“睦邻政策”、肯尼迪时期对拉美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等都有拉美国家欢迎的因素，还有些总统如奥巴马至少在姿态上会做出尊重拉美国家、减少干涉的表示。不同美国总统迥异的对拉政策，对于拉美区域主义产生的作用无疑也是不同的，拉美区域主义的起伏有时也就和美国选举周期的变化相应。其他域外国家对拉美的政策相对稳定一些，对拉美区域主义一般都持同情立场，但也不乏变数。例如，2007年举行的巴西—欧盟首脑会议启动了巴西—欧盟战略伙伴关系，欧盟方面还赞誉了巴西的区域领导地位，直接引发了其他南美国家的不满，也影响了巴西与其邻国的关系。^①只能说，域外国家既有理由尊重拉美的整体性而将拉美作为谈判对手，也有强烈的动机为了短期更具现实性的利益而对拉美特定国家展开双边外交，从而客观上分化拉美国家。具体情况取决于当时的情境和决策者当时的认识，其选择是极不稳定的。

与物质权力因素相仿，意识形态因素的变化也是较为迅速、频繁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与执政者的更迭直接相关，这种变化接近于布罗代尔所说的“事件”。拉美区域主义的“起伏不定”主要就是由物质权力和意识形态因素解释的。当然，它们的变化机制本身都是更为复杂的，受到国内、国际等不同层面因素的影响，两者间相互的影响也是存在的。本文对其变化机制的阐述无疑还不充分，但限于篇幅，也为了保持框架结构的简洁，本文不再对其做更多分析。

不同时段因素对拉美区域主义影响作用的时段、影响的方式和结果可见

^① Andrés Malamud, “Mercosur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and Interregionalism”, 2020, p. 16. https://www.academia.edu/42128622/Mercosur_and_the_European_Union_Comparative_Regionalism_and_Interregionalism. [2020-12-04]

表 1 的总结。

表 1 拉美区域主义的特点与背后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影响时段	影响方向	影响结果	
经济弱势地位		中长时段	大体削弱区域主义实践，但激发区域主义愿望	主要使得拉美区域主义处于弱势状态	使得拉美区域主义“弱而不竭”
地理、文化			大体推动区域主义，对区域主义也有分化作用	主要使得拉美区域主义源源不竭	
拉美区域内外政府政策	政府物质力量、权力因素	短时段	方向不定	使得拉美区域主义“起伏不定”	
	政府意识形态因素		方向不定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三 案例解析：以近年南美洲区域主义为例

南美洲层面的区域主义是拉美区域主义史上的一个较新现象。进入 21 世纪，南美洲层面诞生了一个重要的区域组织南美洲国家联盟，该联盟在诞生后经历了极富戏剧性的命运，一度由盛而衰直至濒于瓦解，但近年又显出些许东山再起之势。在南美洲国家联盟衰微之际，南美进步论坛则应运而生，但现在看来，这一新的组织想要彻底取代南美洲国家联盟也力有未逮。南美洲区域主义如今的局面混乱、缺乏确定性，很难简单地用“好”或“不好”来评价，称其为“起伏不定”“弱而不竭”却很贴切。本部分希望用以南美洲国家联盟和南美进步论坛为代表的南美洲区域主义作案例，具体阐释本文之前提出的拉美区域主义分析框架。

（一）21 世纪南美区域主义的变化

进入 21 世纪，拉美区域主义模式开始更加侧重政治、社会领域，同时突出国家的作用，对 20 世纪 90 年代区域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则十分抗拒。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一系列新的区域组织，南美洲国家联盟也在其中。

最初，南美洲国家共同体（CSN）于 2004 年在秘鲁成立。2008 年 4 月，在委内瑞拉举行的南美能源会议上，各国首脑决定将这一组织更名为“南美

洲国家联盟”。南美洲国家联盟的目标高远而宽泛，从促进一体化、建立南美洲认同、建立南美洲的公民身份，到保护生态多样性、扫除文盲，等等。^①此外，在组织机构的安排上也能看出南美洲国家联盟的雄心：联盟设有自己的议会、银行，在社会、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经济金融等诸多领域都设立了理事会。值得强调的是，联盟还设立了南美洲第一个区域性防务机制——南美防务理事会（SADC）。

在南美洲国家联盟兴盛期，在南美乃至中北美洲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联盟参与并帮助解决了2008年玻利维亚部分省份要求自治的政治危机和2010年厄瓜多尔警察骚乱引发的政治危机，对两国政府给予支持，这对维持两国当时的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②在维护民主方面，南美洲国家联盟对2009年发生的洪都拉斯政变进行了批评，对2012年发生政变的巴拉圭进行了暂停成员国资格的制裁。南美洲国家联盟还致力于维护区域和平，对2010年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断交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在反对美国在哥伦比亚建立军事基地、支持海地灾后重建等问题上，南美洲国家联盟也都有积极行动。^③

不过，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活跃主要集中于其成立后若干年，活动领域则集中于上述的政治领域。随着21世纪初曾一度蓬勃发展的区域主义模式整体上遇到挑战，南美洲国家联盟也未能幸免。联盟在组织人事方面早就出现了危机。依据宪章性的《南美洲国家联盟组织条约》，作为组织最高决策机构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应每年举行一次例会，轮值主席国还可在所有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召开特别首脑会议；联盟的秘书长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根据外长委员会提名来任命，秘书长任期两年，仅可连任一次。^④然而，联盟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于2014年12月举行，之后再也没有召开过，秘书长人选也一直拖延未决：上一任秘书长（也是哥伦比亚前总统）埃内斯

① “Objetivos Específicos”，Unasur. <http://www.unasursg.org/>. [2020-12-20]

② Javier Luciano Quispe Robles, “La Eficacia de Unasur para la Solución de Crisis Políticas en Sudamérica (2008-2013)”, en *Politai: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Vol. 8, No. 14, 2017, pp. 99-116.

③ Edgar Romero, “¿Por Qué la Unasur Ha Perdido su Liderazgo en América Latina?”, 20 de abril, 2018. <https://actualidad.rt.com/actualidad/269152-unasur-perdido-liderazgo-america-latina>. [2020-01-19]; 李紫莹：《阿根廷外交政策演变与南美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载《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2期，第80页。

④ “Tratado Constitutivo de la Unión de Naciones Suramericanas”，Unasur, Artículo 6, Artículo 10, 2010. <https://www.unasursg.org/images/descargas>. [2020-01-21]

托·桑佩尔 (Ernesto Samper) 从 2014 年 8 月任职到 2017 年 1 月, 即他在完成一届任期后又额外工作了 5 个月, 之后一直没有产生新的秘书长。阿根廷、巴拉圭和秘鲁表示反对桑佩尔继续连任, 但当时的轮值主席国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 阿根廷推荐的人选何塞·奥克塔维奥·博尔东 (José Octavio Bordón) 则被委内瑞拉拒绝, 玻利维亚和苏里南也支持委内瑞拉的意见。^① 时任玻利维亚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马马尼 (Fernando Huanacuni Mamani) 给出的理由是秘书长一直由成员国前元首或前外长担任, 而阿根廷推荐的人选不符合这一条件; 他还指责作为前任轮值主席国的阿根廷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② 秘书长人选的僵局导致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和巴拉圭 6 国外长向轮值主席国玻利维亚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4 月) 递交信件表示暂时退出组织活动, 直到组织正常运行再重新参加。

之后, 委内瑞拉内部的危机与南美洲国家联盟成员对委内瑞拉局势态度的分歧直接造成联盟濒于瘫痪。自查韦斯总统执政后期以来, 委内瑞拉国内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而在马杜罗接任总统后, 政府和反对派的政治斗争趋于激化, 国家逐渐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危机。2017 年 8 月, 一些反对马杜罗政府的美洲国家在利马召开会议, 组成“利马集团” (Lima Group), 其中包括南美洲国家联盟成员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和秘鲁, 圭亚那和玻利维亚后来也加入了这一集团。^③ 这些国家认为委内瑞拉政府违反民主、侵犯人权, 并否定委内瑞拉制宪大会和 2018 年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的合法性。2019 年 1 月, 委内瑞拉新任国民会议主席胡安·瓜伊多 (Juan Guaidó) 宣布自己是委内瑞拉总统, 并得到当时除墨西哥外所有利马集团成员的承认。

一些成员国不满意南美洲国家联盟未能对委内瑞拉政府进行制裁, 采取了对联盟不利的行动。2018 年 8 月,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 (Iván Duque Márquez) 宣布哥伦比亚正式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 拉开了成员国纷纷退出的

^① “La Unasur Cumplirá Seis Meses sin Nombrar Nuevo Secretario General”, 26 de julio, 2017. <https://www.nodal.am/2017/07/la-unasur-cumplira-seis-meses-sin-nombrar-nuevo-secretario-general/>. [2020-01-23]

^② “Huanacuni Minimiza Crisis de la Usanur y Convoca a Cancilleres”, 23 de abril, 2018. <https://www.paginasiete.bo/nacional/2018/4/23/huanacuni-minimiza-crisis-de-la-usanur-convoca-cancilleres-177612.html>. [2020-01-24]

^③ 随着政权更迭, 截至 2021 年 10 月, 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政府已经不再对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持否定态度, 甚至有些政府退出了这一组织。

序幕。杜克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能继续再做一个已经成为委内瑞拉独裁统治最大帮凶的组织的一员。”^① 2019年1月，杜克提出与智利等国协商建立新的组织取代南美洲国家联盟。同年3月23日，除委内瑞拉以外的南美国家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会议，其中智利、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巴拉圭、秘鲁一起签署声明，宣布开始筹建南美进步论坛，以之作为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替代品。而在会议前后，巴拉圭（2019年3月）、阿根廷（2019年3月）、厄瓜多尔（2019年3月）、巴西（2019年4月）、智利（2019年6月）、乌拉圭（2020年3月）也相继宣布正式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巴西甚至是在玻利维亚向其移交轮值主席国身份时退出的，而厄瓜多尔则在退出时要求收回联盟设在厄瓜多尔的秘书处大楼。

然而，近来也有一些利好于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动向，使得人们难以断言其“死亡”。2019年玻利维亚在莫拉莱斯总统被迫离职后，新的临时政府改弦易辙，曾表示将考虑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②，但2020年10月，随着左翼“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候选人阿尔塞（Luis Arce）当选，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又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政府表示重新恢复在一系列有左翼色彩的区域组织中的活动。^③ 此外，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秘鲁总统卡斯蒂略在执政后，也都有重返南美洲国家联盟的表示。这些情况也意味着南美洲国家联盟的确“弱而不竭”，在瘫痪中存有生机。

与南美洲国家联盟相对应，南美进步论坛也有着跨领域的目标，但由于其产生时的背景，该组织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更为侧重，本身反映的是拉美右翼的一体化偏好。^④ 南美进步论坛的命运也颇具戏剧性，其诞生时便有了8个成员国，但之后却很难再扩展，成员国间的分歧也逐渐上升。费尔南德斯

^① “Colombia Se Retira de Unasur por Ser ‘Cómplice’ de la Dictadura de Maduro”, 29 de agosto, 2018. https://www.abc.es/internacional/abci-colombia-retira-unasur-complice-dictadura-maduro-201808290139_noticia.html. [2020-01-27]

^② “Canciller: Bolivia Abandonó el ALBA y Analiza su Desvinculación de Unasur”, 16 de noviembre, 2019. <https://www.bolivia.com/actualidad/nacionales/canciller-bolivia-abandono-el-alba-y-analiza-su-desvinculacion-de-unasur-247668>. [2020-12-27]

^③ “El Gobierno de Luis Arce Anuncia que Bolivia Volverá a participar en Unasur, Celac y Alba”, 20 de noviembre, 2020. <https://elintransigente.com/2020/11/el-gobierno-de-luis-arce-anuncia-que-bolivia-volvera-a-participar-en-unasur-celac-y-alba/>. [2020-12-27]

^④ “Declaración de los Ministros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Prosur”, Prosur, 25 de septiembre, 2019. <https://foroprosur.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Declaracion-de-Ministros-de-RREE-1.pdf>. [2020-08-27]

就任阿根廷总统后，在南美进步论坛官方网站记录的一些高层联署宣言、高层会议中都没有再见到阿根廷方面的参与。^① 尽管在新生时，南美进步论坛俨然有取代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势头，但如今其优势除了能正常运转外，南美进步论坛在各方面的作为都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南美洲一体化在整体上可以看作是分裂、混乱的，但也难言完全没有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二）宏观因素与南美区域主义的“弱而不竭”

前文认为，地理、文化、经济等宏观中长期因素决定了拉美区域主义是“弱而不竭”的。南美区域主义作为拉美区域主义的一部分，也同样是弱而不竭的，而这也主要是由上述宏观因素造成的。

相对于其他的拉美次区域地区，南美洲区域主义诞生较晚。相对而言，在“南美”概念的建构过程中，地理因素比文化因素作用更大。从历史文化上看，位居南美大陆的圭亚那、苏里南分别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从英国和荷兰获得独立，国内主要人口为印度裔、非洲裔，和其他拉美国家很不一样，更多被视为政治意义上的加勒比国家。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也确实存在。因此，“南美洲”不是一个传统的历史文化实体，而如学者所言，很大程度上是巴西为投射自身影响力而划定的“地缘政治项目”或“发明”。^② 但从地理上看，南美洲的边界却非常清晰，以巴拿马运河为界与中美洲区分开来。相比中美洲和墨西哥，南美洲整体上距离美国更远，因此相对独立于美国的影响，使得作为政治集团的南美地区可以获得独立性。此外，巴西的领土面积将近占南美洲总面积的一半，又同时与南美洲其余 11 个国家中除智利和厄瓜多尔外的 9 国接壤，天然成为南美洲的中心。综合而言，地理因素使得南美洲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又有（潜在）核心国家的政治群体。所以，南美地区的一体化一旦出现，就不会轻易地淡出历史舞台。批评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国家却仍要构建以南美地区为区域主义框架的南美进步论坛，就说明了地理因素赋予南美区域主义的生命力。

地理因素也部分地决定了南美区域主义的弱势地位。而南美洲北部的国家临近中北美洲、南美洲东西两岸的差异，都在削弱着南美区域主义，使其出现内部分化。也就是说，美国甚至墨西哥的影响力容易延伸到南美洲北部，

^① “Noticias y Prensa”, Prosur. <https://foroprocur.org/prensa/>. [2021-08-27]

^② Susanne Gratius, “Brasil en las Américas: ¿Una Potencia Regional Pacificadora?”, en Fundación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y el Diálogo Exterior (FRIDE), *Working Paper*, No. 35, 200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 [2021-02-06]

而南美洲北部的大国也愿意向北拓展其外交空间；从东西轴线看，面向太平洋和面向大西洋的国家也有着不一样的对外航路。所以，哥伦比亚等南美洲北部国家与美国有紧密联系，委内瑞拉倡导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愿意吸纳更多加勒比岛国，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则倾向和墨西哥一起组成太平洋联盟。这些组织体现了域外大国在南美洲的影响或南美国家超越南美洲边界的地缘政治抱负，同时也削弱了南美洲的向心力。所以，地理因素在赋予南美区域主义不竭生命力的同时，也制造了其发展的天然障碍，拉低了其发展上限。

如拉美其他区域主义实践一样，南美区域主义一直处于某种“疲弱”状态，而这也更多由经济因素导致的。即使在南美洲国家联盟的鼎盛时期，其发展也存在问题。应该说，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工作重心和成就主要在政治领域，在经济等其他领域和具体工作中该组织一直存在“跛脚”的现象。根据联盟基础设施与计划理事会（COSIPLAN）2016年的项目报告，截至当年的581个基础设施项目中，有123个仍处在计划阶段（Profiling），而其中90%早在2012年之前就处在这一阶段。^① 由于南方银行发展不顺，联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倡议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支持。^② 很多成员国在离开南美洲国家联盟时，也对该组织的工作表达了不满，智利外长罗伯托·安普埃罗（Roberto Ampuero）甚至曾批评道，“南美洲国家联盟毫无成绩，无助于区域一体化，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并抱怨智利每年向联盟投入大量资金。^③ 南美进步论坛为克服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弊病，特别标榜组织机构的灵活性、精简和更少的官僚主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南美进步论坛在目标上的有限性，从一开始该论坛的组织机构就未被赋予较大权力。另外，由于没有得到南美国家的一致认可，加上新冠疫情的蔓延影响其正常运行，南美进步论坛成立至今成果寥寥。

南美区域主义的低上限也是南美国家整体经济的弱势地位造成的。初级产品长期是南美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自20世纪90年代后尤其如此，此后

^① COSIPLAN, “Project Portfolio 2016”, UNASUR, 2017, pp. 31–34. <https://www.flipsnack.com/iirsa/cosiplan-project-portfolio-report-2016.html>. [2019-04-28]

^② Marcelo Saguier,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in South American Regional Governance”, in *Global Social Policy*, Vol. 17, No. 3, 2017, p. 267.

^③ “Chile Considera que Unasur ‘no Conduce a Nada’”, 23 de abril, 2018. <https://www.elespectador.com/noticias/el-mundo/chile-considera-que-unasur-no-conduce-nada-articulo-751687>. [2019-04-30]

“南美洲国家凭借初级产品专业化通常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初级阶段”^①。尽管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中很多南美国家经济增长势头迅猛，但这也是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的一系列经济危机之后，而且为期相对短暂。这种情况下，南美国家难以真正突破“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桎梏而取得长足发展，彼此经济的互补性也难免不足。弱势的经济地位使得南美各国对短期经济得失十分敏感；南美大国如巴西本身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对外援助受到民意的反对，无法大量提供公共产品^②；各个小国也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一方面期待外来援助，另一方面又担心遭到外来资本的剥削。在南美洲国家联盟成立的当年 2008 年，厄瓜多尔总统就曾因与巴西建筑巨头奥德布雷希特（Odebrecht）的纠纷而拒绝偿还巴西贷款，引发了两国争端。南美国家的经济疲弱让这些国家无力、无意支付区域主义活动的预先成本，也就不能推动区域主义达到更高的高度。

（三）物质权力因素与南美洲区域主义的“起伏不定”

前文提到，政治享有物质权力情况的短期变化会导致区域主义的起伏。本部分会说明，南美区域国家（特别是大国）政府物质权力的变化确实与南美洲国家联盟、南美进步论坛的兴衰密切关联。

在本文关注的时段内，在整个南美洲，巴西的综合实力遥遥领先，其人口（2017 年）、领土面积、经济总量（2017 年）等数据都是南美洲第二名的至少 3 倍以上。^③ 除巴西以外，一些学者指出南美洲也存在着一些“次级强国”，包括阿根廷、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智利。^④ 总的来讲，上述 4 国在领土、人口、经济总量等数据上虽不能与巴西相比，也远超其他南美小国；这 4 国在不同方面各有优势，整体实力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可以说，巴西和这 4

^① 张勇、史沛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机遇：全球价值链视角》，载《太平洋学报》，2018 年 12 月，第 37-38 页；[英] 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张森根、王萍译：《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第三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422-424 页。

^② Janina Onuki, Fernando Mouron and Francisco Urdinez, “Latin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Regional Identity and Leadership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Contexto Internacional*, Vol. 38, No 1, January/April 2016, pp. 433-465.

^③ 以上信息根据世界银行相关的数据计算得出，参见 <https://data.worldbank.org/cn/>。[2020-04-14]

^④ 参见 Javier Luciano Quispe Robles, “La Eficacia de Unasur para la Solución de Crisis Políticas en Sudamérica (2008-2013)”, en *Polítai: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Vol. 8, No. 14, 2017, p. 104; Daniel Flandes and Leslie Wehner, “Drivers of Strategic Contestation: The Case of South America”, en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Working Papers*, No. 207, 2012, pp. 163-164. 实际上，秘鲁在领土、人口等数据上的排名也较为靠前，但由于其经济总量和军费开支低于前述国家，本文未将其纳入讨论。

国是南美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棋手。进入 21 世纪后，这些国家在地区外交和军事力量发展上表现更为积极。^① 特别是委内瑞拉在 21 世纪初的活动格外活跃，在查韦斯总统执政时期，有利的石油价格大大提升了委内瑞拉当时的经济实力，使其可以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南美次区域和拉美地区的一体化事业中。

如学者所言，“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领导区域的雄心，催生了种种区域一体化组织，南美洲国家联盟也是其中之一。”^② 也就是说，在“南美五强”中，有 3 个支持南美洲国家联盟，其中包括实力远超他国的巴西，其合力足以克服域内其他反对力量。尽管另两个次级强国智利、哥伦比亚对南美洲国家联盟的热情度有限甚至不无异议，但联盟的发展也有了基本的保证。

巴西很大程度上是南美洲国家联盟的首倡者。巴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有整合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两个区域组织的想法，自 2000 年起，巴西的卡多佐总统（1995—2002 年执政）又发起了一系列南美国家首脑会议，开始讨论建立南美国家间的一体化组织。^③ 经过这一系列会议，南美洲国家共同体终于在 2004 年诞生。此后，随着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执政权力的巩固，其对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推动作用也日益明显，促成了南美洲国家共同体向南美洲国家联盟的转变。“南美洲国家联盟”这一名称就来自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提议。委内瑞拉及其盟友使得南美洲国家联盟相比过去的南美洲国家共同体更侧重政治、社会议题，拓展了联盟的目标。^④ 虽然联盟与巴西最初的设计并不完全一致，但此后巴西依然对其保持了热情，南美防务理事会的建立就是源自巴西的建议。巴西和委内瑞拉对联盟的设想有所不同，两国在联盟中也存在竞争，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委内瑞拉和巴西更愿意私下协

^① 各国军事力量发展情况可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关于军费开支的数据库，<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2020-04-14]；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该数据过分低估了委内瑞拉的军费开支，近年来委内瑞拉也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参见 Jeff Colgan, “Venezuela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 i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Issue 4, 2011, pp. 547-556.

^② Javier Luciano Quispe Robles, “La Eficacia de Unasur para la Solución de Crisis Políticas en Sudamérica (2008-2013)”, en *Politai: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Vol. 8, No. 14, 2017, p. 104.

^③ Paul Kellogg,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Dawn of an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 in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29, No. 2, June 2007, pp. 196-197.

^④ José Briceño-Ruiz, “From the Sou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to the 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a Rising Regional Process”, in *Latin American Policy*, Vol. 1, No. 2, 2010, pp. 217-226.

商并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一致”^①。在很多问题上，南美洲国家联盟融合了委内瑞拉和巴西的意志，体现了两国的合力。另外，阿根廷在基什内尔夫妇执政时期也对联盟做出了贡献。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在其卸任阿根廷总统（其妻当选为新的阿根廷总统）后成为联盟的首任秘书长，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参与了对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争端的调停、斡旋，帮助促成了两国最终的和解，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当事国的认可。^② 联盟在厄瓜多尔总部的秘书处大楼也被命名为“内斯托·基什内尔大楼”，这也反映出阿根廷当时对这一组织的支持和影响力。

然而，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国内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甚至在巴西、阿根廷的中右翼政府上台之前，左翼政府对区域一体化的支持力度就已经下降。

从整体上看，在 2008 年经济危机后，这 3 国的整体经济形势已不如从前；从 2010 年到 2016 年，3 国都在一些年份中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况。雪上加霜的是，巴西和委内瑞拉还因为内政中的矛盾进一步被分散了精力。在罗塞夫总统执政后期，巴西国内反腐案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危机，最终罗塞夫被弹劾下台。自 2014 年开始，委内瑞拉的经济开始严重恶化和衰退，国内也随之出现了社会、政治动荡，反对派一方面借助其主导的国会对抗政府，另一方面不断游行示威、对政府发起冲击。委内瑞拉政府的执政基础遭到削弱，无暇再对外投入。委内瑞拉政府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还引来了域内右翼政府的批评和干涉，于是委内瑞拉成了南美洲国家联盟的争议焦点，直接诱发了联盟的崩解。

南美进步论坛最初是由智利和哥伦比亚两国发起的，这并非偶然，而是区域权力结构微妙变化的反映。在发起提议的 2019 年之前，尽管这两国经济增速并不是拉美最为突出的，但整体表现远好于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且都在 2018 年经济表现优异。两国也确实存在对自身力量的乐观情绪，如哥伦比亚一直在谋求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并终于在 2020 年如愿以偿；而智利领导人皮涅拉在 2019 年 10 月还骄傲地宣称智利是拉丁美洲的

^① Rita Giacalo, “Venezuela en Unasur: Integración Regional y Discurso Político”, en *Desafíos*, Vol. 25, No. 1, 2013, p. 143.

^② “Chávez: Kirchner Jugó Rol Clave en la Paz entre Venezuela y Colombia”, 28 de octubre, 2010. <https://www.americaeconomia.com/politica-sociedad/politica/chavez-kirchner-jugo-rol-clave-en-la-paz-entre-venezuela-y-colombia>. [2022-01-24]

“绿洲”^①。两国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加自信，开始愿意扮演区域领导者的角色。^②不过，智利和哥伦比亚的愿望都没有实现，因为就在 2019 年年底，两国国内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哥伦比亚政府与国内游击队的和解进程也再次出现新的波折。这让南美进步论坛的发展在短期内丧失了两国的推动力。2020 年，新冠疫情给南美主要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区域主义议题在近两年陷于沉寂。

总之，可以看到南美区域组织的兴衰和区域国家政府政策的变化彼此伴随。近年来，拉美国家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是相对迅速的，拉美区域主义波动的频率也随之加快。国内政治动荡、新冠疫情这样的不可控因素进一步加深了政府力量变化的意外性，也加剧了区域主义发展的波动性。

（四）意识形态因素与南美洲区域主义的“起伏不定”

总体而言，在 21 世纪，曾经导致拉美国家相互敌对而破坏区域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显著存在。如前所述，拉美国家的各政治力量原则上都是支持拉美一体化的，更多地把邻国视为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像玻利维亚、秘鲁虽然和智利有领土或领海争端，但这些争端并不能从根本上阻碍这些国家对区域一体化的支持。当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它更多稳定地潜伏在拉美国家对主权的关注中，其作用是长期限制拉美区域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度，而不是影响其短期表现。

在 21 世纪，在短期内导致拉美区域主义剧烈振荡的还是左翼与右翼的意识形态竞争，这两种政治力量对于区域主义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因此在国内和区域层面都相互冲突。简单而言，在 21 世纪的拉美地区，左翼与右翼的分野主要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极度排斥，认为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拉美国家的经济灾难，而右翼一般都继承了新自

^① Emilio Lara, “Piñera Califica a Chile como un ‘Oasis’ ante Convulsiones Económicas y Democráticas Latinoamericanas”, 8 de octubre, 2019. <https://www.biobiochile.cl/noticias/nacional/chile/2019/10/08>. [2021 - 11 - 10]

^② Fernando Alaya, “Chile Tres Cancilleres en Tres Años;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Piñera (2018 - 2020)”, 5 de enero, 2021. <https://www.nodal.am/2021/01/chile-tres-cancilleres-en-tres-anos-la-politica-exterior-de-pinera-2018-2020-por-fernando-ayala/>. [2021 - 10 - 30]; Edgar Andrés Londoño Niño, “Iván Duque y la Búsqueda Errática de Liderazgo Regional”, 7 de octubre, 2019. <https://revistafal.com/ivan-duque-y-la-busqueda-erratica-de-liderazgo-regional/>. [2021 - 11 - 10]

由主义对小政府、经济自由、贸易开放的推崇。这种差异也反映在两种政治力量的区域观中。

20世纪90年代时，拉美国家曾普遍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彼时流行的“开放的区域主义”也与此相对应，是亲市场、重贸易的。而在21世纪初，新的区域主义被称为“后自由主义”或“后霸权主义”，^①这时的区域主义更多由反对过度全球化、反对过分偏重经济自由的左翼政权推动，不再聚焦自由贸易，而是在政治、社会领域有更高的一体化目标。这种新的区域主义与20世纪90年代的区域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就南美洲的区域主义而言，南美洲国家联盟属于“后自由主义”“后霸权主义”的区域主义潮流，而南美进步论坛则是对“开放的区域主义”的回归。

在南美洲国家联盟筹建之初，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成员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大致共识。在21世纪头10年南美洲国家联盟初建之时，正是左翼力量在这一地区蓬勃发展之际。^②暂且排除苏里南和圭亚那^③，从2007年到2016年年初，在南美洲10个讲西语、葡语的拉美国家中，每年都有7~8个国家由左翼执政，而剩下的2~3个国家也并非由强硬的右翼统治，如智利的皮涅拉政府（2010—2014年）和秘鲁的加西亚政府（2006—2011年）尽管不是左翼，但当时在意识形态上都相对温和务实，与众多左翼政府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对立（不过，皮涅拉在2018年再次当选后，对区域左翼政府的态度则较为

^① 参见 José Antonio Sanahuja, “Del ‘Regionalismo Abierto’ al ‘Regionalismo Post-liberal’”. Crisis y Cambio en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 en América Latina”, en Laneydi Martínez Alfonso, Lázaro Peña y Mariana Vazquez, *Anuario de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Gran Caribe 2008 - 2009*, Buenos Aires: Coordinadora Reg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Económicas y Sociales (CRIES), 2008, pp. 11 - 54; José Briceño - Ruiz and Andrea Ribeiro Hoffmann, “Post-hegemonic Regionalism, UNASUR,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merica”, in *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2015, pp. 4 - 7.

^② 关于这一时期拉美左翼政府的界定，参见徐世澄：《中国学者对拉美左翼政府的政策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2，第53页；苏振兴：《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变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第4页。

^③ 这两国情况较为特殊，它们在地理上位于南美洲，但在文化、语言上不属于拉丁美洲，两国参与区域主义的情况也与其他南美国家很不相同。这两国的政治分野在传统上主要是族裔的而非意识形态的，两国国内意识形态的格局也和其他南美国家不同。圭亚那两大政党在历史上都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2010年当选苏里南总统的鲍特瑟（Dési Bouterse）在意识形态上基本属于左翼，与委内瑞拉等国交好。圭亚那在2019年加入南美进步论坛，更多是因长期与委内瑞拉有矛盾而非典型的意识形态原因。2021年，苏里南也对南美进步论坛表达了好感，此时接替鲍特瑟的单多吉（Chandrikapersad Santokhi）总统尽管属于中左翼，但和鲍特瑟矛盾很深，在外交政策上和前者完全不同。圭亚那、苏里南参与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情况和意识形态更相关，但其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而接近南美进步论坛则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因素所能解释的。

强硬)。这一时期只有哥伦比亚和巴拉圭的右翼政府与左翼政府不时产生摩擦，而哥伦比亚在桑托斯总统于2010年上任后也一度调整政策，缓和了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的关系，并尝试在南美洲国家联盟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无疑，在存在相互竞争的区域主义模式时，区域国家间的共识可以避免区域主义运动的内耗，推动区域一体化前行。

特别是在区域大国之间，意识形态共识也起到粘合剂的作用。如前所述，主要推动南美区域主义的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3国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和发展目标的差异：巴西将南美洲视为自身能施加特殊影响的区域，希望成为南美洲的领导国；委内瑞拉在南美洲国家联盟之外，还推动着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这样以自身为中心、不限于南美国家参与的区域组织建设，希望成为拉美地区左翼国家的领导；阿根廷在一些问题上会选择制衡巴西，如力推包含墨西哥等中北美洲国家参与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此稀释巴西的影响力。此时，能在权力竞争中调和各国关系的正是3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帮助淡化了大国间的竞争色彩。很多学者认为在卢拉、罗塞夫等左翼领导人执政时，巴西在南美洲的权力是一种“共识性霸权”或“软权力”，这也说明了意识形态对于维系区域稳定的重要性。

然而，有利于区域主义的意识形态分布情况在之后几年间就快速发生了变化。首先，拉美的左翼政党接连失去政权，阿根廷在2015年、秘鲁和巴西（2016年）及智利（2018年）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此外，2017年厄瓜多尔新任的左翼总统莱宁·莫雷诺（Lenín Boltaire Moreno）在当选后也和国内左翼力量分道扬镳，诸多政策更为接近右翼。以上情况直接导致了区域政府间的左翼共识消失。其中，巴西、阿根廷的政权转换对区域左翼力量的削弱尤为严重。

这种情况下，一些原本之前可以平稳着陆的问题就酿成了区域组织的危机。2012年，巴拉圭的左翼政权被以有争议的方式弹劾下台，巴西、阿根廷等左翼执政的区域大国在达成共识后暂停了巴拉圭在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成员资格，并未给区域主义的发展本身造成很大影响。但随着左翼共识不再，类似的2017年洪都拉斯选举争议和2018年尼加拉瓜的政治危机等问题都引发了南美国家间的激烈争执，而委内瑞拉这一南美洲国家联盟重要成员国的危机则成为斗争的焦点，诱发了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崩解。成员国在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时，往往也直接以意识形态为理由，如阿根廷对

其最终退出联盟所给出的理由除了秘书长人选长达两年的空缺、联盟近年行政管理的混乱外，还包括联盟的议程“含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内容，偏离了最初的目标”^①。南美洲国家联盟的迅速瘫痪是近年内区域意识形态形势对比变化的结果。

南美进步论坛虽然在短期内崭露头角，但其随后的发展略显平庸，反而是南美洲国家联盟重现生机，这也与地区政府意识形态更迭速度的加快有关。在除圭亚那、苏里南之外的拉美 10 国中，在南美进步论坛成立的 2019 年 3 月，有 7 国是由中右翼政府执政，左翼执政的主要地缘政治棋手只有委内瑞拉 1 国，在 2020 年时中右翼执政的国家甚至还曾达到 8 个。而截至 2021 年 10 月，此时中右翼执政的国家虽然仍有 6 个，但左翼在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两个重要国家都取得了政权，右翼相对左翼的优势已不再突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区域意识形态格局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也造成南美进步论坛如今的声势远不如初创之时，而南美洲国家联盟则意外地重获希望。^②

在本文关注的时间段，南美国家与美国的实力对比情况没有质的变化，此时影响美国对南美区域主义影响的因素主要是美国的具体对拉政策。总体而言，美国对南美洲的关注度是有限的，这也为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兴起创造了一定条件。然而，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特别是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对委内瑞拉的敌意逐步加深，采取了一系列敌视委内瑞拉等左翼政权的政策。美国的态度无疑对区域右翼力量有所鼓励，也为南美进步论坛的活跃创造了条件。^③ 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南美的区域政策也常常随南美地区局势变换而有所调整，这也给南美区域主义在短期内的的发展增加变数。

四 结语与展望

总之，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整体大势是由一些历史上相对稳定的情况塑

^① “La Argentina Se Retira de la UNASUR”, 12 de abril, 2019. <https://www.cancilleria.gob.ar/es/actualidad/noticias/la-argentina-se-retira-de-la-unasur>. [2020-04-14]

^② 不过，不同的区域左翼政权如今在对委内瑞拉、古巴等国政府的态度上也存在裂痕，因此区域左翼政权的重新风行是否意味着南美洲国家联盟走向复兴，还有待观察。

^③ 严谨：《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2期，第32页，第36页。

造的，但短期内又很容易受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样看来，在短期内预测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态势和方向相对困难，因为这需要预测各个拉美国家执政力量的变换及其短期内的力量发展情况。当然，由于新冠疫情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很可能令拉美国家政府在短期内都境况窘迫，拉美区域主义也因而在短时间内都难以取得大的进展。

放眼更长远的未来，拉美区域主义大体也将保持现状。拉美国家的地理、人文情况基本是常量，而拉美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想要在经济领域真正突破在国际上的边缘地位也并非易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拉美区域主义仍将是拉美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主题，但仍难以取得质的飞跃。与此同时，虽然拉美不同派别政府的更迭与力量变化难以准确预测，但考虑到选举的周期性，至少政权变换依然会是普遍现象，拉美区域主义的“起伏不定”恐怕也将长期延续。

本文主要说明了拉美区域主义长期“弱而不竭”与具体时段中“起伏不定”现象产生的原因。不过，区域主义“起伏”的具体时间节点并非本文可以解决的，这涉及对政府政策这一短时段因素的细化分析，需要探讨政府力量和意识形态兴衰的具体原因及两者间的交互作用，这是未来研究可以展开的方向。

(责任编辑 王 帅)